

崇圣贤经是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一切学问，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等，都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甚至可以说，经学是正统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对我们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的文化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

renshengchengzhangdianjishicongshu

S HENGZHE

REN SHENGLU

圣者 人生路

先天地生 寂兮廖兮



xiantiandi
sheng jixiliaoxi

主编：堵军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

圣者人生路

主编 堵军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崔承范

责任校对:魏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者人生路/堵军主编.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4.12

(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

ISBN 7-80698-345-7

I. 圣… II. 堵… III. 人生哲学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9242号

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

堵 军 主 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363号, <http://www.ybcbs.com>.)

北京铁建印刷厂印刷

延边人民出版社发行 印数:0001—5000册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62印张 3210千字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98-345-7/C·20

定价:475.20元(全24册)

本册定价:19.80元

编者絮语

文学是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描摹，是对人类生存经验的艺术表现和思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之窗。文学作品是人类精神产品的一座宝库，她时贯古今，地连八方，浩如烟海，璀璨辉煌；在这里不是珍藏着一颗珍珠，而是各民族珍珠美玉的荟萃，踏入这座殿堂，你的面前会出现无数个新的领域，你可以从此了解到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心理状态等等也会透过纸缝，活跃在你的面前。文学作品不仅给人以知识，而且给人以教育。文学也是人学，尤其是那些优秀的作品，总是或多或少地阐述人生的道理，有的甚至有着深刻的见解，虽处异国异地，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启迪，受到教育。

人生之中，什么是“成功”呢？《广辞苑》里对“成功”一词下的定义是“完成事业”，而《辞典》把 success(成功)解释为“尝试或努力取得理想的结果。”

我们在本套丛书中，多次使用“成功”一词的意思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生活是自己创造的。每个人都会时常面临生活、工作和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处世方法、工

作态度、努力程度、思维方式和心态信念等等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成败。

不论干什么，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功，都试图尽量避免失败或走弯路。《人生成长奠基石丛书》也正是你成功奔向自己的理想、轻松而潇洒地生活的一盏明灯。本套丛书通过大量的、丰富的内涵，使读者在轻松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学会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人生，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多一些得，少一些失，多一些成，少一些败。

如果你希望摆脱平凡的生活，如果你想追求卓越的品质，如果你想探索成功的奥秘，如果你想充分地发展自我，展现自我。那么，请你试着选择本套丛书，在闲暇无聊或苦闷彷徨的时候，打开它，不管你是浅尝，还是深味，本丛书都会给你指导，给你安慰，给你鼓舞，给你力量！

编 者

2004年9月

目 录

第一章 孔子与经学现象	(1)
一、孔子与六经	(2)
二、儒学与经学	(6)
三、今古文经学	(11)
四、崇圣尊经的文化传统	(14)
第二章 经学与政治	(18)
一、“大一统”的政治意义	(19)
二、“尊君卑臣”的政治原则	(22)
三、德教与法治	(26)
四、以经取士的选官制度	(29)
五、改革家的工具	(34)
第三章 经学与教育	(38)
一、崇儒立学的传统	(39)
二、奴化式的经学教育	(44)
三、学校与科举	(48)
第四章 经学与伦理	(53)
一、从“五伦”到“三纲”	(53)
二、父为子纲：孝亲	(56)

三、夫为妻纲：节烈	(59)
四、君为臣纲：忠君	(63)
五、传统士大夫的“气节”	(68)
第五章 经学与哲学	(72)
一、儒家哲学的实用理性	(72)
二、儒学与阴阳五行说	(76)
三、儒学与佛老之学	(81)
四、儒家哲学的困境	(85)
第六章 经学与史学	(88)
一、史官文化的传统	(89)
二、《春秋》笔法	(93)
三、六经皆史	(97)
第七章 经学与文学	(103)
一、“赋诗言志”与“美刺”原则	(103)
二、实用主义的文学传统	(108)
三、“言志”与“载道”	(113)
四、非正统文学的正统化	(117)
第八章 经学与学术	(122)
一、经学笺注主义	(123)
二、义理之学	(127)
三、考证之学	(131)
四、文字之学	(136)

第一章 孔子与经学现象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夫子的大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皆尽知，甚至远传到海外，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虽然孔子在生前并不得志，但在身后却享受了人间少有的殊荣。他本人被尊为“至圣先师”，他所传授的六经被奉为圣经法典，而他在山东曲阜的故居也成了中国文化的圣地，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得千里迢迢去行礼朝拜。历代的朝廷照例要封一位孔子的后裔为“衍圣公”，让孔子的血脉代代相传。所以，在中国的千家万户之中，也许只有孔氏一家的世系才一脉相传，历经两千多年从未中断。这也许是孔子生前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在这种崇圣尊经的文化背景下，经学，即注经之学，也成为了一门至高无上的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即经、史、子、集四部书中，经学居于首位。经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哲学、史学、文学或其它别的什么学，但它似乎又包括了所有这些学问。所以，古人甚至有“经学以外无学问”的说法。在过去，中国人崇奉着孔圣人，捧读着圣人传下来的经典，形成了一种唯圣唯经的文化传统，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了两千多年的经学现象。

一、孔子与六经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当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大多还生活在原始的大森林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在黄河流域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上古华夏文化。《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儒家所谓的六经,就是春秋以前上古华夏文化的遗存。《诗》是春秋以前贵族与平民的乐歌总集;《书》是上古之史,是古代的官方文献汇编;《礼》记古代的冠、婚、朝、聘、丧祭等礼仪;《乐》是音乐之书;《易》是卜筮问神之书;《春秋》是鲁国 242 年间的编年史。总之,六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渊藪,它汇聚了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所创造的文化业绩。

六经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古籍,但它们却包含了很多了不起的创造性的思想与智慧,甚至令我们现代人也赞叹不已。例如,《易》中的阴阳观念,其实就是一种深刻的符号思维模式。它认为阴(符号--)与阳(符号一)是两种普遍的物性,宇宙本是无,阴阳相合而生出天(☰),地(☷)、雷(☳)、山(☶)、火(☲)、水(☵)、泽(☱)、风(☴)等八卦即八种基本物质,八卦再两两相重,演成八八六十四卦,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即由此而生。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就是从这种思维模式中受到启发,发明了以“0”与“1”(同阴阳相对应)为基本运算单位的二进位制。而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程序语言正是二进位制。《尚书》中的五行观念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这与古希腊的“四大元素”说一样,是一种朴素的科学认识论。至于《诗经》中的比兴抒情手法,更是具有超时空的艺术魅力,不但对两千年来的中国诗歌发生了

深远影响，而且吸引了西方诗人的注意。美国意象派的代表诗人庞德曾将《诗经》译为英文，取名《孔子颂诗集》，风行一时。它对西方现代派诗歌运动的影响，早已成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六经中所包含的上古华夏文化的辉煌成就，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在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由贵族垄断，六经即是帝王官府所掌的“官书”，是贵族之学。六经中所汇聚的上古文化只为贵族所享有，只为贵族所传习，这自然给六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在尚无文化自觉意识的古代先民心中，由祖先世代代积累创造出来并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自然是一种神圣的典范，容易引起后来者的无限崇拜。所以，作为上古文化典籍的六经要受到尊崇，看来正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它们被抬到吓人的高度，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神圣法典，却与孔子有不解之缘。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家庭。孔子的出生实在太平凡了，他的母亲既不是因为“梦日入怀”而有感，也不是因为吞食了鸟卵而受胎，虽有一些迷信传说，而实是因为与一位名叫叔梁纥的普通百姓“野合”——古代所谓“桑间濮上”的男女欢会——而生下了孔子。孔子少年时是很微贱的，那时，受教育还只是贵族的特权，他完全靠自学获得了六经的知识，并且终生学而不厌，拜过许多人为师，所以，过去曾流传着“圣人无常师”的传说。其间的艰难困苦，我们是不难想象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孔子才立志要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把六经中的文化知识广泛传授给平民子弟，让他们也有机会学习享有王官垄断的贵族之学。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首开私家讲学之风，广招弟子，有教无类，普及教育这实在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自然在教学过程中要对这些上古的文化典籍加以整理编次，于是后代便有孔子编定六经垂教万世的说法，认为六经出自孔子之手。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诗原有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复者，定为三百篇，而且“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声”；又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等等。至于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更是由来已久，如孟子即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实，六经原本是古代先王的旧典，王官所掌，贵族所习，孔子只是首先将六经由官学变为私学，他是六经的第一位非官方的传人。后代传授六经的学者，追根溯源，都要归结到孔子，并因此而产生六经出于孔子之手的种种说法，也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孔子不仅仅只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书先生，而且也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思想家与活动家。他当过鲁国管理牧场与仓库的小官，也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并曾一度摄行相事，掌管国政，但他执政的时间很短，未来得及全面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就下了台。他只好带着几个学生，一车两马，周游列国，风餐露宿，不辞辛劳，以求得到某一位君主的赏识，结果却四处碰壁，凄凄然如“丧家之犬”。最后连孔子自己也禁不住失望地哀叹：“凤鸟不至，河不出书，我这一生恐怕是完了吧！”他甚至想乘竹筏子漂洋过海。在这种心境之下，自然容易生出一种怀旧心理，对古代典籍上所描述的古代先王的太平盛世悠然神往，这也是古今中外的人情之常。所以，孔子对尧、舜、禹、汤、文王、周公赞美备至，倾心向往。孔子说他自己传授六

经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是基于这一怀旧心理的特定的思维模式。他以周文王之后中国文化的传人自许，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他的志向宏大，要行尧、舜、禹、汤、文王、周公之道，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言而喻，作为政治家的孔子在阅读六经时，理所当然持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而并非学者式的实证主义态度。他是按照自己特有的思维模式即从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理解传授六经的。尤其当他不得志的晚年，退而讲学，更是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寓于对六经的传授解说中，“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六经只不过是发挥自己政治理想的一个题目而已。比如一部《红楼梦》，革命家看见排满，才子看见缠绵，经学家看见《易》，道家看见“淫”，俞平伯看见情场忏悔，等等，孔子之于六经，也可作如是观。

孔子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对后代经学传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认为，在孔子之前，《诗》、《书》、《礼》、《乐》等六经只不过是上古的文化典籍，无所谓“经”，直到经过孔子之手，它们被赋予了治国平天下的意义，才成其为万世不易的圣经法典。也就是说，孔子以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始读出了《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中的垂教后世的经学意义，它们才具有了超乎寻常的价值，否则，它们只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死文字。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比如孔子论《诗》，一则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一则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其实用主义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一部《诗经》，既有王公贵族颂美王政之作，也有平民百姓“各言其情”之歌，怎么都可能“思无邪”呢？原来孔子按照他自己的思维模式把一部《诗经》读成了道德之

诗,于是《关雎》那样的情诗也具有了“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特点,到后代经学家那里,更演化为歌颂“后妃之德”的赞美诗了。又如《易》,本是一部玄奥的“天书”,据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把系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三次。相传他曾作《彖》、《系》、《象》、《说卦》、《序卦》、《文言》等十篇文字即所谓“十翼”来解说《易》的意义。但孔子并不是把《易》当巫书来读,而是当作道德哲理书来读,如《序卦》说:“有阴阳然后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如《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以与几也;知终,终之,司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固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等等,与巫术已全然没有关系。《史记·滑稽列传》曾引孔子的话说:“六艺(即六经)之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显而易见,孔子注重的是六经的实用功能,他是以一种非历史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看待六经,孔子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两千年经学研究的思维模式。所以,六经中所包含的我们的祖先创造性的思想与智慧反而被忽视了,反外国学者去利用了,经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只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与圣人的微言大义,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不幸。

二、儒学与经学

儒家原是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孔子生在春秋乱世,那时,诸侯主掌政权,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他所倾心向往的古代

文化传统将坠于地。孔子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世者，传道授业，入仕从政，一生都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虽然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与教育家，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构成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体系，而他所传授的六经则成为儒家学派代代相传的经典。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即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孝亲、慈幼、悌兄弟、和夫妇、信朋友。以至于忠国、亲民、爱物，皆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是“仁”的具体表现与扩展。总而言之，“仁者，爱人”。他主张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来达到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同时，孔子又认为家庭社会都存在一定的结构秩序与等级差别，如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的关系也是相对的，有等差的，亲疏、尊卑、长幼、贤愚等等分层是理想的秩序结构，人之所以为人，家之所以为家，国之所以为国，社会之所以为社会，总之，要达到“仁”的理想境界，必须维护这一秩序结构。于是孔子提出了以“礼”为中心内容的治世方案，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从形式上看，礼无非是人类日常行为举止，死丧婚姻、朝聘宴享、祭祖祀神等活动的一些仪式规矩；但从内容上看，礼却是一定的等级秩序与行为规范的具体体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等“仁”的境界，都要依靠具体的礼仪节文来实现。所以，孔子非常注重个人的人格培养与道德完善，希望通过礼的规范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人人依礼而行，各安其分，和睦共处，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在孔子看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是圣明天子，他们有伟大的人格与完美的道德，足为万世垂范。面对诸侯力政、礼崩乐坏的局面，他希望

统治者能“宪章文武，祖述尧舜”，修己、恤民、礼让，实行贤人政治，以德政礼治来化行天下。孔子的这些思想，被儒家后学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如孟子即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提出了由己及人的“推恩”原则，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主张实行“仁政”，以教为政，以礼为治。即使是具有法家思想的儒学大师荀子，也没有放弃孔子所提出的基本思想原则，仍然强调“礼治”的决定作用。经过孔、孟、荀等儒学代表人物的大力传播，儒家学派终于成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中的一门“显学”。

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为法则的儒家虽然是“显学”，但它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当此之时，诸侯各自为政，大一统的集权政治尚未形成，自然思想上也是百家争鸣，没有普天下必须尊奉的学说或主义。你有你的主义，我有我的主张，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墨子提倡“兼爱”，“尚贤”，庄子主张“返朴归真”，商鞅提倡“奖励耕战”，韩非的“法治”，杨朱的“为我”，邹衍的“五德始终”，等等，各以其说争鸣于世。儒家主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法家则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墨子的“兼爱”，孟子可以斥其为“无父无君”，而儒家的六经，庄子也可以贬之为“圣人之糟粕”，韩非更将儒生比为“下蠹”之一，认为应当严加禁绝。即使在儒家内部，也是各持异说。孔子主张“尊君卑臣”，孟子则认为君臣应当平等相待，“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讎”，甚至主张对桀纣那样的暴君可以诛而杀之。孟子认为“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荀子则针锋相对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应当以礼

节之，以法治之。当此之时，儒家学派充满了批判精神与生命活力，它并不是凭借权力，而是以自己的思想力量征服了人心，成为诸子百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学派。

比较而言，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学说于人生人心似乎最为切近，孔子的“仁爱”，孟子的“仁政”，也许永远只是善良的愿望或空想的乌托邦。但在人与人互为仇敌、勾心斗角的现实世界中，这种理想境界毕竟可以是人类的一种精神依托，一种慰藉，一种信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人类大同，正是古往今来的大多数人类倾心向往的。也许这种思想并不现实，但却能让人感到有一种博爱的胸怀在，表现出一种以慈爱为怀的“贤人作风”与“圣人气象”。所以，现代学者胡适曾说，孔子的学说是“爸爸政策”，孟子的学说是“妈妈政策”，比较之下。老子的学说似乎太玄远了一些，墨子的学说似乎太偏执了一些，庄子的学说又太任性了一些，韩非子的学说则太冷酷了一些，而孔孟则是从人类的普遍心理与善良天性出发，以慈悲仁爱为怀，中庸、大度，而又切实，所以“于我心有戚戚焉”。

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吞并诸侯，统一天下，建立起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大一统封建专制王朝。政治上的一统势必导致思想上的一统。他于是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禁绝诸子百家语，焚烧《秦纪》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于不属于博士官的私家所藏的《诗》、《书》等也限期缴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的以吏为师。不久，又在咸阳城外坑杀了四百多名儒生，天下震动。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此举的目的在于消灭思想，让天下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从而使其一统江山“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他的目的并未达到，儒家与诸子百

家虽遭到空前的沉重的打击,但却并没有灭绝,更没有失传。当秦王朝垮台后,诸子百家又勃然复兴,风行天下,在汉初又一度出现了百家争鸣、异说蜂起的局面。

但是,继秦而起的大汉王朝,实行的依旧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同样的课题也就作为当务之急摆在了汉朝最高统治者的面前。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下诏征集贤良,并亲自在宫中策问治国大计,儒学大师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他建议:“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学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自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思想定为一尊。汉武帝统一思想的具体办法很简单,只不过“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而已。《乐经》亡于秦火,所以只立了《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书的博士,让他们在太学传经授业,培养弟子,朝廷同时又向全社会征集儒林人物,给他们官做,天下学士莫不靡然风从,争相趋之。自此以后,儒学成为官学,孔子成为钦定的圣人,五经也成为钦定的圣经法典。读经之人日增,传经之学日盛,而注经则成为一家专门之学,即所谓经学。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经学成为中国古代的最高学问,高居于一切学问之上。

经学以儒家经典为内容,但与儒学又有所区别。儒学是私学,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而经学则是官学,是天下学者必须尊奉的金科玉律。看起来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不同,但正是这种形式上的转变,使儒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儒学向经学的转变,使儒家充满批判精神与创造性思想的学说成为禁